

# 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文化遗存的编年与谱系研究

朱永刚<sup>1</sup> 王立新<sup>2</sup>

(1、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通过 2002-2003 年, 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较大范围考古调查及重点遗址发掘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 经对器物类型学研究, 划分为 9 种文化类型, 由此构建起该流域区先秦古文化遗存的编年序列。其中, 林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遗存和井沟子青铜时代晚期墓葬, 为首次发现确认的两种新的文化类型。文章就上述古文化遗存的面貌, 特征, 性质, 年代展开讨论, 并进一步从文化谱系上廓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文中主要观点有三: 1、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具有地域分布边缘性和谱系多源化的特点; 2、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在本地晚商遗存与来自下辽河流域高台山文化结合的基础上, 吸收多种文化因素整合的结果; 3、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新发现的井沟子青铜时代晚期墓葬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后者是迄今认定的最有可能为东胡族的考古遗存。

**关键词:** 西拉木伦河 编年 谱系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西拉木伦河属辽河水系, 发源于大兴安岭南端的昭乌达高原, 源头为沙里漠河和萨里克河, 东至科尔沁沙地北缘的通辽。本文所涉及的范围, 包括克什克腾旗南部、林西县、巴林右旗、巴林左旗和翁牛特旗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经区域, 方位大体在北纬 43°—44°、东经 117°—120° 之间。这里地处蒙古高原向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 地势西高东低, 西部多山地和狭长的河川谷地, 东部为较开阔的洪积平原, 间有沙地及丘陵。年平均气温 2—4℃, 降水量为 300—400 毫米, 基本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sup>[1]</sup>。

西拉木伦河以北, 由于多旱少雨, 地表极易受风力降水侵蚀, 生态环境脆弱。现生业状况表现为农业与畜牧业兼营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纬度偏低, 水热条件更适于农业生产的西拉木伦河南部区域相比, 西拉木伦河既是一条反映不同生业的临界线, 同时由于南北区域环境上的差异, 也必然影响到两地的古文化面貌, 意味着各自带有区域性的色彩。

## 一

自 1930 年, 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在林西和阿鲁科尔沁旗采集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 并撰文立说, 开始了我国考古学者对该地区史前文化的探寻工作<sup>[2]</sup>。之后, 又有汪宇平、李逸友、郑隆、吕遵谔等诸位先生, 多次进行考古调查<sup>[3]</sup>。不过这些工作几乎都是地面上的, 所以当时对所谓“细石器文化”的认识只能通过简单的类比作出一些年代方面的推测。1960—1961 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巴林左旗的考古调查中, 发现各地点含细石器遗存面貌上的差别。为了进一步了解其文化内涵, 在被统称的“细石器文化”范畴区分出不同的文化类型。1962 年, 发掘了富河沟门, 南杨家营子和金龟山遗址<sup>[4]</sup>。这次工作的主要收获有三: 一是根据富河沟门遗址出土遗物, 提出了富河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命名; 二是在南杨家营子遗址确认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的地层关系; 三是在金龟山遗址发现早于富河文化的遗存(尽管当时主观上并没有把它作为单独的考古遗存辨认出来, 而事实上为再认识该地区新石器年代体系提供了重要线索<sup>[5]</sup>)。可惜这项探索性的工作没能继续下去。

长期以来内蒙古东部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老哈河流域, 而偏北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则因考古工作较少, 见诸发表的资料和研究十分薄弱。80 年代中后期, 为配合国家“平双公路”和“集通铁路”的基本建设,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林西县白音长汗和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

发掘。白音长汗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先后三次发掘，面积达 7000 多平方米，共发现了 7 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或类型<sup>[6]</sup>。其中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四种文化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基本上确立了该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要发展序列。龙头山是单纯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从 1987 年至 1991 年共发掘四次，揭露面积 5000 余平方米<sup>[7]</sup>。该遗址发掘不仅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分期、年代、地域特点及聚落布局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而且将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文化序列从新石器延伸到青铜时代。此外，经发掘的还有克什克腾旗南台子<sup>[8]</sup>、上店<sup>[9]</sup>，林西水泉<sup>[10]</sup>，巴林左旗二道梁<sup>[11]</sup>，巴林右旗塔布敖包等<sup>[12]</sup>。上述发掘成果使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体来说，地域考古工作不平衡的现状仍有待改进。

## 二

全面了解该流域古文化遗存的面貌、特征，填补文化发展序列上的缺环，从文化谱系上廓清各文化的关系，是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考古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带着这一课题，2002 年至 2003 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重点遗址发掘。

此次考古调查，涉及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和巴林右旗三个旗县。先后踏查的遗址有：克什克腾旗的天宝同、河套、上孤山子、山前、永明、沟门、影蔽山、关东车、字山、广太和、大营子；林西县的井沟子、西樱桃沟、点将台、东台子；巴林右旗的塔布敖包、查干浑迪、十家子、小林场、和布特哈达、呼特勒、古日古勒台、查尔斯台、那斯台、锅撑子山等，共 25 处，在 40 余个地点采集到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实物标本（参见 2002—2003 年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调查遗址位置示意图）。这些遗址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上游及查干木伦河和嘎斯太河沿岸，多座落于发育较好的河谷二级台地上，背山面川，地势相对平缓开阔，由于长期人为滥垦及过度放牧等原因，大部分遗址地表裸露，水土流失较严重，已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地表暴露的遗物较多，一般采集到陶片，石器，兽骨等，并见有灰土圈、石砌台形建筑、墓葬等遗迹。

通过对采集与发掘遗物的识别，并经分类对比研究，可划分为 9 种不同的文化遗存，按编年顺序排列如下：

1、以查干浑迪为代表的素面陶筒形罐文化遗存，面貌与小河西文化相似。

2、兴隆洼文化。面貌具有兴隆洼文化的一般特征，但陶器的纹饰与布局更接近于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这类遗存目前多见于西拉木伦河以北，并反映出与兴隆洼文化的一些差别，所以有人称为“南台子类型”<sup>[13]</sup>。

3、以井沟子西梁为代表的遗存。在已知的考古文化中还没有与之相类似者，年代约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晚期或略有超出，拟命名为“西梁类型”<sup>[14]</sup>。

4、赵宝沟文化。仅见于山前、查尔斯台、十家子等几个遗址。在同一遗址，按采集标本的个体数量统计，发现率远低于红山文化。

5、红山文化。以查尔斯台和那斯台遗址最为丰富，地表散布有大量的陶片、石器以及动物骨骼，其中细石器较多。那斯台遗址面积很大，现场观察，依稀可辨成排黑灰土遗迹及残留的灶址。从这两处遗址采集到“之”字纹陶片，以纵向排列为主，口沿多饰有附加堆纹，器底习见席状编织物印痕，文化面貌与赤峰西水泉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遗存相同<sup>[15]</sup>。

6、夏家店下层文化。仅见于和布特哈达和呼特勒，遗址破坏严重，原始地面几乎无存，周围已完全沙化。

7、晚商遗存。在塔布敖包、呼特勒、和布特哈达采集到这类陶片数量不多，均为夹砂红褐陶，突出的特征是在口沿和领腰处施戳印纹或泥条堆纹，有的还饰有珍珠纹，鸡冠状鬃耳。从口沿残片观察，器形有鬲、罐类。在以往考古文献中，相同特征的类型品还见于克什克腾旗天宝同<sup>[16]</sup>、林西

沙窝子<sup>[17]</sup>。

8、夏家店上层文化。这类遗址发现数量较多，尤其以克什克腾旗和林西县境内分布密集，向东则有所减弱，文化面貌与龙头山遗址相似<sup>[18]</sup>，与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比较，地域特点明显。

9、以井沟子西区墓葬为代表的遗存，层位关系晚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而且在墓葬结构、丧葬习俗和随葬方面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明显有别，这些差别的存在，表明井沟子西区墓葬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考古遗存，暂拟称为“井沟子类型”<sup>[19]</sup>。

上述9种文化遗存，几乎涵盖了西拉木伦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已知的考古文化。其中，林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遗存和井沟子青铜时代晚期墓葬两种首次确认的考古遗存，为本地区先秦不同时段考古文化增列了新内容，在对以往文化谱系研究重新审视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 三

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不懈的努力，辽西地区已确认的新石器文化上至8000年以上，下至4000年前后，它们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编年体系，展示了该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如果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早期尚属空白，不过近些年来随着华北北部一系列万年前后新石器早期遗存的发现<sup>[20]</sup>，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辽西地区，相信在这里找到独立进入新石器时代古文化的源头只是时间问题。目前所认识的小河西文化大体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诸文化则处于中、晚期发展阶段。后4种文化在各自主要文化成份的相互链接上具有同一文化谱系的延续性，可大体认定是单一体系发展的考古文化。

小河西文化因敖汉旗小河西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房址为长方形或近方形的半地穴建筑，有大小规格之区别，系成行排列，房内见有灶坑和柱洞。陶器的质地均为夹砂陶，拙厚，火候较低，外表呈黄色或黄褐色。发现的器形主要是平底敞口筒形罐，几乎均为素面，少数在口沿下贴塑有长条形、圆圈形、波折形泥条。石器有打制的锄形器、环形器、石球、饼形器和石刃骨梗鱼鳔等。经过发掘含有这类遗存的遗址有敖汉旗西梁、榆树山，翁牛特旗大新井<sup>[21]</sup>，林西县白音长汗<sup>[22]</sup>，阜新查海<sup>[23]</sup>。据悉在喀喇沁旗马架子<sup>[24]</sup>，敖汉旗孟克河沿岸<sup>[25]</sup>，克什克腾旗富顺永<sup>[26]</sup>，巴林右旗富山地<sup>[27]</sup>，锦西杨家洼<sup>[28]</sup>，也曾发现过类似陶片，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其分布范围还有扩大的趋势。关于小河西文化的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早于兴隆洼文化。这主要是通过它们陶器特征的类比，以及白音长汗遗址提供了层位学方面的依据<sup>[29]</sup>。但也有学者指出，白音长汗遗址的兴隆洼文化年代普遍偏晚，所以尚不足以直接对两者年代作出判断<sup>[30]</sup>。最近发表的查海遗址1992—1994年度发掘报告<sup>[31]</sup>，有些情况值得关注。其一，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对遗址的分期，含草划交叉纹陶器的房址晚于单纯出素面陶器的房址，而早于灰褐陶之字纹陶器的房址，由于草划交叉纹属于兴隆洼文化偏早阶段出现的纹饰，所以素面陶遗存早于兴隆洼文化。其二，从查海遗址平面布局来看，出素面陶器的房址仅见于遗址的西北部（Ⅱ区），且排列方式与大多数与兴隆洼文化房址相一致，两者只是在临界范围发生打破关系。遗址分期也显示素面陶作为单独序列，在遗址的晚期仍可见到其踪迹。由此表明两者在一段时间内是并存的。其三，如果把素面陶作为小河西文化的典型特征，阜新查海的素面陶筒形罐口沿下均有一条施斜线纹的附加堆纹带，风格统一，地域特征明显。事实上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素面陶筒形罐，与西拉木伦河以南认定的小河西文化同类器也有纹样上的区别。据此我们提出三点认识：1、小河西文化比兴隆洼文化在辽西出现的年代早，但并不排除两种文化有共时的可能；2、小河西文化素面陶特征及简单的泥条装饰手法，与兴隆洼文化陶器表面施满纹饰的风格明显不同，就目前揭示的材料来看，两者之间不存在承继或衍生关系；3、应该注意这种素面陶遗存已显露出来的地域上文化面貌的差别。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含兴隆洼文化遗物的遗址有，山前、西樱桃沟、塔布敖包、查干浑迪、小林场、呼特勒、古日古勒台等。采集的陶片均夹砂，一般颗粒较小，分布均匀，系有意掺入，也有少数夹粗砂和云母者。器表多黄褐色，但由于烧制不匀，陶色不纯正。可辨认器形只有筒形罐，腹壁

较直，器底普遍较厚。纹饰以压划为主，口沿部饰凹弦纹和索状条带纹（一种以平行斜线为底，其上复施间距较大凹弦纹构成的纹样），其下主体纹饰有交叉纹、平行斜线纹，也间有细密的类之字纹。上述遗址采集的石器，多见大型打制亚腰锄形器，琢制环形器及磨盘、磨棒等。从文化面貌来看，这类遗存具有兴隆洼文化的一般特点，但器形、纹饰更接近于白音长汗遗址的兴隆洼文化一期遗存<sup>[32]</sup>，与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出土的大部分陶器也很相象<sup>[33]</sup>。以目前对兴隆洼文化分期的认识，无外叠唇，无附加堆纹凸泥条带，被视为早期遗存。

以林西井沟子西梁为代表的遗存，文化面貌独特。陶器质地疏松，硬度较低，吸水性强。器形以筒形罐为主，器壁普遍较厚，器表多为黄褐色，陶胎见有石英砂颗粒。其纹饰特点突出，以条形堆纹和线型压划纹所构成的组合纹样，与目前辽西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均不相同。石器方面，以大型打制砍伐器出土的数量最多，形制古朴，器体敦厚。其它石制工具，如敲砸器、锋刃器、斧形器、石球等加工粗糙，器表仍保留有较多的自然面。通体磨制的石器较少，磨盘、磨棒多残断，发现的细石器均为石叶。结合骨角制品和房址堆积内大量的动物烧骨分析，该遗址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农业迹象并不明显。

这种遗存的原生单位在井沟子西梁遗址为首次发现，清理的 11 座房址无叠压或打破。根据个别房址废弃堆积中出有典型红山文化遗物的层位关系，可以判定西梁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年代早于红山文化。从技术层面分析，也表现出某些新石器较早期遗存的特点。如与兴隆洼文化相比较，在陶器的质地，制法，烧制火候，石器的分类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均有共性特征。然而，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显著的。从房址的形制结构来看，西梁遗址房址规格较小，有凸字形门道和储物壁龛。另外，居室地面和壁面经过特殊加工的房址，沿壁穴内四周均有柱洞，中部设有圆形石板灶。以上列举各项，均有别于兴隆洼文化。从陶器造型和纹饰来看，西梁遗址出土的陶器，筒形罐器身普遍较矮，弧腹者器底与腹壁结合处修成抹圆形。流行在器口沿施平行条形堆纹及各种极富特色的泥条堆塑纹样。以压划为特点的线型主体纹饰，一般不分段，近器底处留有不施纹的空白。兴隆洼文化的筒形罐器体瘦高，腹壁斜直，下腹壁与器底结合处呈钝角。典型纹饰布局为口沿下饰有数道凹弦纹，主体纹饰为分段的交叉或平行斜线纹，中期以后流行之字纹，并形成口沿叠唇和附加泥条堆纹带的三段式布局定式。另外，西梁的砍伐器与兴隆洼的亚腰锄形器类比，后者窄柄，宽肩；前者无明显柄与肩的分界，只在器身两侧修琢出对称凹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梁遗存与兴隆洼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别，而且也不能将其归入辽西地区已认定的其它新石器文化，所以应另立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拟命名为“西梁类型”<sup>[34]</sup>。西梁遗址采自房址居住面上的 2 个木碳样本，经碳十四测定，年代分别为 7060±50 年 BP、6885±50 年 BP（半衰期 5568 年，未作树轮校正）。采用同一标准，比对兴隆洼、白音长汗、查海等遗址提供的 7 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兴隆洼文化的年代跨度大体在 7500—6500 年前后<sup>[35]</sup>。显然，以西梁为代表的这类遗存的年代约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晚期或略有超出。

在强势的兴隆洼文化衰落之时，辽西地区的文化发生了较大变化，由原来“统一”面貌的一种考古文化，分化成内涵各异年代相近的文化遗存，形成了多种文化并立的局面。此间，在西拉木伦河以南至大小凌河一带出现的是赵宝沟文化及彩陶出现之前的早期红山文化；燕山以南，滦河上游与沟河之间出现的是上宅文化和相类似的遗存。西拉木伦河沿岸及其迤北地区的情况较为复杂，至少有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和西梁类型四种遗存，它们与兴隆洼文化存在着年代或谱系上的接继联系，在时间上则相互参差，并在某一时间段有两种以上的遗存可能是共时的。

根据本次调查的情况来看，赵宝沟文化主要见于查干木伦河以西的西拉木伦河上游。含赵宝沟文化的遗址有，天宝同、山前、塔布敖包、十家子、查尔斯台。此前，经过发掘的克什克腾旗上店<sup>[36]</sup>、林西县白音长汗<sup>[37]</sup>、林西县水泉<sup>[38]</sup>及翁牛特旗小善德<sup>[39]</sup>等，也都在这一区域范围内。这里发现的陶器上多施印有窄幅长体线型或篦点之字纹。经仔细观察这种长体之字纹，两端无明显支点窝，推测系片状抹角施纹工具连续折压而就，并以纵向排列为主，通体施印。从之字纹的施纹风格和排列方式来看，均与典型赵宝沟文化（指敖汉旗小山和赵宝沟遗址）有别。水泉遗址出土的扁体罐和斜口罐为该地区所见的新器型，而赵宝沟文化典型的尊形器，及这类陶器表面所饰的种种神化了的

动物纹样，在上述遗址都不曾发现。此外，山前和白音长汗遗址中出土的一种两侧平缘长体舌状石器，也为西拉木伦河以外的其它两个区域极为少见。显然西拉木伦河南、北区域，乃至燕山以南的沟河、滦河流域的赵宝沟文化存在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别。如果说以往关于赵宝沟文化起源于渤海北岸的提法，尚嫌证据不足。最近又有学者指出，作为赵宝沟文化显著特点的几何形纹饰，应源于兴隆洼文化泥条带上的勾连波折纹，在白音长汗即可找到兴隆洼文化晚期这种几何纹已由泥条带上发展到某种特定器物腹部的例证<sup>[40]</sup>。事实上，阜新查海遗址的兴隆洼晚期筒形罐上也出现了以勾连纹为母题的几何纹饰，并且与赵宝沟文化同类纹饰几乎完全一致<sup>[41]</sup>。种种迹象表明，赵宝沟文化的几何纹饰并非首先生成于某一地区，然后向周围推广开来，而是与兴隆洼文化的某些压印纹饰有关，兴隆洼文化晚期已普遍孕育着产生新文化的躁动，由此引发的文化变异可能是在上述几个地区同时出现的。由于地域文化面貌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所以各地赵宝沟文化也呈现出相互间的区别。

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已知红山文化分布广泛，东自克什克腾旗的永明、天宝同、河套，西至哲里木盟开鲁县的大榆树、坤都岭、兴安等<sup>[42]</sup>，尤以西拉木伦河上游沿岸和查干木伦河流域较为密集，并与赵宝沟文化交错分布，两种文化遗存出现在同一遗址的情况也不少见。而在乌尔吉木伦河及科尔沁沙地北缘，红山文化有减弱的趋势，更鲜有赵宝沟文化的发现。

查尔斯台和那斯台是位于查干木伦河下游右岸的两处重要遗址，也是本次重点复查的遗址。查尔斯台西北距巴林右旗大板镇 23 公里，遗址座落于查尔斯台哈日花山南侧坡地上。遗址已受到严重破坏，局部见有黑灰土遗迹和残留的灶址，1987 年当地文管部门调查时还发现有成排的房屋<sup>[43]</sup>，但在此次复查中已难觅踪迹。该遗址在东西长约 300 米，南北约 150 米范围的地表都散见有遗物。那斯台北距查尔斯台约 8 公里，南距西拉木伦河 14 公里，遗址座落于查干木伦河以西地势较平缓的二级台地上，视野十分开阔。现场观察，遗址中心除被那斯台村民房占据一部分外，已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可辨黑灰土遗迹和残留的灶址，地表散布有陶片，石器和动物骨骼等。该遗址范围很大，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曾采集和征集到包括玉器在内的大量遗物<sup>[44]</sup>。从采集标本的个体数量统计，查尔斯台和那斯台遗址的主体遗存是红山文化，而本次在查干木伦河调查的情况反映，红山文化类型品的出现率远高于赵宝沟文化。所以仅从两种文化的分布状态来看，它们的繁荣阶段并没有同时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出现。而根据白音长汗和水泉遗址提供的红山晚于赵宝沟文化的层位关系也证实它们并不共存，至少在西拉木伦河流域难以认同这两种文化有平行发展的关系。

目前，红山文化的早期遗存仅在兴隆洼遗址有少量发现<sup>[45]</sup>，通过其陶器的质地，筒形罐的造型和纹饰特征观察，不排除对兴隆洼文化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所知两种文化的面貌和绝对年代都相距较远，因此兴隆洼文化晚期、红山文化早期的内涵与特征，两种文化之间有无过渡性文化，以及红山文化形成时期是否融入了其它文化因素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新的发掘和深入研究才能逐步解决<sup>[46]</sup>”。

红山文化晚期遗存发现的遗址多集中于大凌河上游，以宗教祭祀性遗址和积石冢为主。这一时期除泥质陶比例有所增加，新出现了一些专门用于祭祀的器型和新的彩陶纹样等，仍然继承了上一阶段遗址红山文化的主要特点。西拉木伦河以北的那斯台遗址曾出土有大批玉器及彩陶图案的菱形纹、重环纹，鳞纹等具有红山文化晚期特征的类型品，不过该遗址未经大面积揭露，是一般居住性遗址还是像牛河梁那样特殊性的遗址，尚不得而知。

接下来的小河沿文化，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呈现明显的衰退现象，从敖汉旗调查资料了解到，小河沿遗址数量仅为红山文化的五分之一<sup>[47]</sup>。本次对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没有发现可明确辨认的小河沿文化遗物，以往也仅在克什克腾旗的上店和林西白音长汗见有这类遗存<sup>[48]</sup>。从陶器群不难看出，小河沿文化的组成含有多种文化成份，如取代之字纹的拍印线纹应来自华北或中原；豆座上的三角形镂孔的和八角星图案，表明其曾接受过大汶口文化影响；此外还有吸收庙子沟文化因素的反映。但筒形罐作为主要器类仍然延续着当地的传统并没有改变。这一文化的主要特征基本是继承了红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就目前的认识，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以单一体系传承更迭的诸考古学文化，是辽西地区贯穿始终的一条文化发展主线。

西梁遗址所揭示的一类遗存文化面貌独特，尤其是其发达的条形堆纹及组合纹样极易辨识。检

视以往考古调查发掘材料，已在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多个地点发现类似的陶器<sup>[49]</sup>，目前这类遗存仅见于西拉木伦河以北，在西拉木伦河以南尚不见报导。西梁类型的碳十四测定结果与兴隆洼文化相去不远，但文化面貌的显著差别，当暗示两者在文化谱系上的分异。同时它们又有一些相似之处，如西梁类型一部分敞口斜直壁筒形罐的造型接近于兴隆洼文化；西梁最富特色的多条并列堆纹与兴隆洼的多条凹弦纹，在对器口沿装饰的表现形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在巴林右旗锅撑子山采集到的一件筒形罐，除造型与兴隆洼相似外，其口部所饰的条形堆纹，被刻意修抹成凸凹的瓦棱状，看起来兼具有西梁和兴隆洼两种陶器施纹风格的双重特点<sup>[50]</sup>。尽管上述情况反映两者存在某种相互间的联系，不过作为西梁类型主体文化特征的条形堆纹陶器并非是由兴隆洼文化派生出来的，而辽西地区已识别的新石器考古文化序列相互连接的链条中，也很难插入西梁类型这一环节，西梁类型的主源可能来自相邻的考古文化区。

关于西梁类型发达的条形堆纹来源于松嫩平原甚至更北的黑龙江中游区域的认识已有论及<sup>[51]</sup>，而仅见于乌尔吉木伦河大体与赵宝沟文化并行的富河文化，其饰有篦点之字纹的陶器也被排除在辽西地区已构成的自兴隆洼至小河沿连续演进的文化序列之外，就文化因素分析，它与松嫩平原及东西伯利亚南部的新石器文化有较多的相似性<sup>[52]</sup>，但同样纹饰的陶器在西拉木伦河以南却较为少见。由此表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不仅存在一条单一谱系的发展序列，而且还存在着游离于辽西主体文化序列之外的谱系线索。对于后者，不论是西梁类型还是富河文化，它们在融入当地文化之前，主体文化成份可能来自区域间文化的传播，甚至不排除有居民的长途迁徙。所以，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具有地域分布边缘性（相对辽西文化区而言）和谱系多源化的特点。

#### 四

此次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共发现 4 种青铜时代的遗存，即夏家店下层文化、晚商遗存、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以林西井沟子西区墓葬为代表的一种遗存。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地点虽然只有 2 处，但却颇为重要，为确定该文化分布北界提供了重要线索；晚商遗存采集到的陶片数量不多，其特点有别于魏营子类型；对林西井沟子墓地发掘所揭示的一种新的考古遗存，则填补了本地区晚期青铜时代文化的缺环。上述考古发现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田野工作来加深了解，相关问题也有待澄清，但围绕建立西拉木伦河青铜文化编年序列及谱系研究方面已有了突破性进展。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仅见于和布特哈达和呼特勒，遗址位于查干木伦河与嘎斯太河交汇处的东西两侧，隔河相对分布，南距西拉木伦河约 40 公里。由于受风沙的强力侵蚀，除残存的几处突兀的台地外，原始地面已无存，周围几乎全部沙化。从坍塌的台地剖面可见黑灰土堆积，其中含有细小的绳纹陶片。地表采集到的陶片有器口沿、鬲裆、实足根等，夹砂黑灰陶，薄胎，火候较高，器表拍印绳纹，纹理较细并饰有间断划纹。石器有亚腰石锄、截面呈三角形的棱形石刀。据悉，现陈列于巴林右旗博物馆的 1 件灰陶绳纹鼓腹罐也是在和布特哈达所得。以往了解，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老哈河及西拉木伦河南侧主要支流沿岸，遗址分布的非常密集，有的学者推定其分布的北界不超过羊肠子河<sup>[53]</sup>。本次调查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西拉木伦河以北找到了有原生堆积的这种文化遗址。看来这里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盲区，所不同的是，与西拉木伦河以南这一文化持续稳定的分布相比，大概只有小规模渗透。那么，什么原因阻碍了其向北的扩展？此间是否有另一种考古文化相对峙，这类遗存的文化面貌和性质如何，这些都是存疑的问题。不过有些情况值得关注。许多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既有对辽西古文化的继承，又有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多种文化因素的发展。然而依目前对辽西古文化编年的认识，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还有一段时间上的空白。就陶器而言，尽管两者在某些器形上有一定的承袭关系，但陶器群的整体差异十分明显，如果将两者衔接起来的话，似乎其间还存在着某种有待认识的遗存。彰武平安堡二期遗存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线索<sup>[54]</sup>。这类遗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素面磨光筒形罐存续的同时出现了袋足三足器。如果说辽北地区筒形罐的消失和袋足三足器出现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表现为代表着两个时代标志性陶器的并存。

以往在奈曼旗大沁他拉发现过 2 件素面磨光陶的筒形罐，其腹部置有对称的桥耳或釜耳，造型

与平安堡二期的同类器相似<sup>[55]</sup>。作者曾将这类遗存析出，认为它不同于辽西地区已识别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年代应介于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sup>[56]</sup>。另外，上世纪 50 年代，在林西县锅撑子山也采集到 1 件夹砂灰褐陶筒形罐，该罐大口、筒腹、素面、领口部上下各有一周附加堆纹，两道堆纹之间饰有珍珠纹（一种以钝头小棒由器壁内外顶压而形成的圆突状纹饰）<sup>[57]</sup>。同时采集到的遗物还有红褐陶鬲足。这种饰附加堆纹和珍珠纹的筒形罐，年代大体可断在晚商前后<sup>[58]</sup>。如果将以上例举材料联系起来看，在西拉木伦河沿岸及辽北偏西等地，作为当地筒形罐谱系的延续，可以设想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北界，还应存在着另一种考古遗存。而提出这一设想的另一证据是，自 1986 年以来，伴随着松嫩平原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该区域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序列与谱系关系已日渐清晰，尤其是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认识取得了重要进展。根据对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资料的分期研究，可以确认松嫩平原先于白金宝文化夏至晚商的第一、二期遗存都是以筒形罐为主体的，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只是二期遗存陶鬲与绳纹的出现所暗示文化风格的转变。白金宝三期遗存是白金宝遗址的主体，此期完成了松嫩平原陶鬲对筒形罐的取代<sup>[59]</sup>。这一演变过程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如果没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作用，当地文化按正常发展途径不会发生文化面貌的剧烈改变；其二，较之辽西核心区域，松嫩平原筒形罐与陶鬲的交错替过程要晚的多。由此比照处于辽西边缘地带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尤其是北岸区域，完全有可能与松嫩平原文化的发展阶段是同步的。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从新石器时代两地就已经发生了文化联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两地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所呈现的某些共同的时代特征也证明了这一点。

辽西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出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陶器群以素面红褐陶为特征，陶器制作工艺粗糙，火候不高，但青铜器相当发达，尤其是林西大井铜矿址的发现和一批具有地方特色仿陶铜容器的出土，表明其青铜铸造水平和生产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是一种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兼有相当畜牧业成份的考古学文化。

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不仅年代偏早，而且文化面貌与其分布范围南部地区也有所不同。本次在这一地区的考古调查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多分布于倚山伴河的岗阜或台地上，遗址面积不大，堆积较薄，文化内涵单一。克什克腾旗影蔽山遗址，南距西拉木伦河约 4 公里，遗址东西长约 500 米，南北宽约 150 米。在这里发现依山势人工修凿的多层平台，平台边缘有用石块砌筑的护坡，地表黑灰土遗迹清晰可见。遗址除采集到大量的夹砂红褐陶片、石器外，还见有散落的人骨。关东车遗址位于克什克腾旗经棚镇东 25 公里处，在该遗址清理的房址为地穴式，居住面平坦硬实似经烧烤，穴壁设有壁龛。墓葬的结构为袋状坑套梯形土坑竖穴式，随葬的器物有陶壶、铜斧、铜刀及铜装饰品。与此结构形制完全相同的房址和墓葬在龙头山遗址也有发现。以上例举的情况，在以赤峰、宁城为中心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南部区尚未见报道。而通过陶器与青铜器的对比分析，以文化内涵之差异，考古学界一般观点认为，可将夏家店上层文化南北区域划分为以典型遗址命名的龙头山和南山根两种文化类型。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别，既有受周邻文化影响强度不同而形成的文化演进中的分异，也有因对比资料不充分或年代上的参差所造成的某种假象。那么哪些是年代上的差别，哪些是地域差别，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并准确把握分期与偏年，来促进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

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是目前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发掘面积最大，所获资料最丰富的一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sup>[60]</sup>。该遗址由祭祀地，居住地和埋葬区三部分组成。据悉，有如龙头山遗址这样“圣”、“俗”二元对立的聚落布局，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并非孤例，而是规模较大遗址普遍存在的一种布局模式<sup>[61]</sup>。根据遗址的层位关系，结合典型器物的类比分析，对以往的分期与编年结论进行了修正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可将该遗址存续的时间分为三期：第一期大约相当于商周之际；第二期为西周中期前后；第三期应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sup>[62]</sup>。在此分期基础上，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全面梳理、归纳，所确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总体分期方案中，人们不难发现北区西拉木伦河流域除个别墓葬外，基本属于早、中期阶段，缺乏最晚期的遗存；南部区以往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大多可归于中、晚期阶段，而罕见较早时期的遗存。所以就目前该文化早期遗存的分布情况来看，距今 3000 年左右夏家店上层文化应首先兴起于西拉木伦河流域。

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来源，以往有研究者曾通过陶器文化因素的分析，尤其是直腹腔陶鬲的

谱系研究,推定其主要来自东方下辽河流域的高台山文化<sup>[63]</sup>。由于两种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最为接近,所以这一推测还得到了人种学方面的证明<sup>[64]</sup>。但构成夏家店上层文化另一类陶鬲,如龙头山遗址早期遗存和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均发现的花边口沿鬲<sup>[65]</sup>，“这究竟是吸收大小凌河流域魏营子文化（类型）的因素,还是承自当地晚商遗存”<sup>[66]</sup>,一时尚未得其解。事实上,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出现的魏营子类型遗存主要见于大小凌河流域,而在努鲁儿虎山以西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域内则很少发现,且文化性质一直未能确认。由于龙头山遗址的分期编年将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上限定在商周之际甚至更早,所以当排除两种文化的直接承袭关系。

在本次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调查中,发现含晚商遗存的遗址有,巴林右旗的呼特勒、查尔斯台、和布特哈达和塔布敖包。上述地点采集到一些夹砂红褐陶系的陶片,突出特点是口沿和领部施有戳印纹和泥条堆纹(所谓花边口沿陶器),有的领部饰有珍珠纹或鸡冠状突饰物。从口沿残片观察,器形有直领和弧领两种,应为鬲、罐类器物<sup>[67]</sup>。以往在林西锅撑子山<sup>[68]</sup>、巴林右旗古日古勒台<sup>[69]</sup>、科尔沁右翼中旗小白音胡硕<sup>[70]</sup>,也曾采集过相同器形和纹饰的陶片。联系到早年克什克腾旗天宝同<sup>[71]</sup>、翁牛特旗头牌子<sup>[72]</sup>,曾发现过的殷商青铜容器,看来西拉木伦流域也与相邻的大小凌河和松嫩平原一样,可以专门划分出一段晚商时期的遗存。目前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还很难说清楚,但在上述区域这种具有明显时段特征的类型品(主要饰花边口沿鬲)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并在已建立起的不同区域文化发展序列中起到了上下连接的作用。所以西拉木伦河流域晚商遗存与随之兴起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此外还可以分析出一些来自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如仿桦树皮和仿皮囊式陶器,施印于陶器上的鹿形或马形纹样,分叉装柄式柳叶铜镞、素面铜镜、大型铜鹿牌饰等。其中,饰有篦点几何纹和动物纹的仿皮囊陶器等,可能直接来自于松嫩平原的白金宝文化。对龙头山遗址所见的几种青铜器,林沅先生曾指出,柳叶铜镞独特的装柄方式,其原始形式和铸范均发现于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和额尔齐斯河;背面有单纽的素面铜镜和形式多样的动物形铜牌饰,也是在北方草原地带先流行起来然后向东传输的<sup>[73]</sup>。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最具代表的銜柄式短剑,其联铸剑柄和早期的直刃剑身形式,显然借鉴了北方系短剑的形制,而这种铜剑的祖型甚至可追溯到曾流行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式短剑<sup>[74]</sup>。由此推定,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初渗入的北方地区诸文化因素,也是该文化形成机制的一个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从文化结构的多样性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有可能是在本地晚商遗存与来自下辽河流域高台山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并吸收多种文化因素整合的结果。

夏家店上层文化结束之后,其原分布范围的努鲁儿虎山以西地区遗址非常稀少,据文献记载,在战国燕文化到来之前曾是东胡族活动的领地。所以一些研究者怀疑这里已变成一片宜于放牧的游猎之地,将很难寻觅到物质文化遗存。近年来,先后发表的敖汉铁匠沟 A 区墓葬<sup>[75]</sup>和水泉墓地北区墓葬<sup>[76]</sup>两批材料,由于年代都被推定在春秋晚至战国早期前后,而格外引人关注。

本次发掘的林西井沟子墓地,位于西拉木伦河以北,经过对遗址西区的全面揭露,共清理墓葬 58 座,灰坑 9 座<sup>[77]</sup>。在发掘中,发现有 3 例墓葬打破夏家店上层文化灰坑的层位关系,说明以墓葬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在年代序列上当晚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井沟子西区墓葬皆长方形或窄梯形土坑竖穴墓,不见石质葬具,双人以上的合葬墓多于单人葬,殉牲现象普遍,随葬陶器墓葬的比例较高。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比较,首先,在墓葬形制与丧葬习俗方面明显有别。其次,这类遗存陶器以夹砂素面红褐或灰褐陶为大宗,器表颜色驳杂,色泽偏于灰暗。器形以形体较大的带领罐为主,另有少量的叠唇罐、四足或三足鬲、钵、壶,不见豆。从陶系、器物组合、形制风格等方面观察,较之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出土陶器有显著差异。第三,随葬的青铜器如凸格扁茎直刃剑、舌形铜坠饰、变体鸟首形饰以及骨器中的梭形或长方形骨扣、骨镞、弓弭等基本不见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此外,长铤骨镞也颇具自身特色。这些差别的存在,表明了井沟子西区墓葬为代表的遗存应是区别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一种新型遗存,拟暂称为“井沟子类型”。

井沟子遗存中缺乏可与中原文化系统直接比较并用于断代的遗物。不过,所出随葬品却与敖汉铁匠沟 A 区墓葬和水泉墓地北区墓葬具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铁匠沟 A 区三座墓葬出土的几件陶器

均可在井沟子西区墓葬的陶器中见到形制十分接近者,两处墓地都出有风格一致的变体鸟首形铜饰、素面和放射短线纹的铜泡、弹簧式耳环、瘦高喇叭状铃形饰、有釜三翼铜镞、S形卷云纹铜饰等。而井沟子所出的叠唇罐,与水泉墓地北区墓葬的同类器则极为相似。以上类比显示了它们彼此年代上具有共时的特点。由于被类比的材料年代均认定为春秋晚至战国早期前后,井沟子遗存的年代大体亦相当于这一阶段。采自井沟子墓葬的2个木碳样品,经常规碳十四测定,年代分别为 $2115 \pm 65$ 年BP和 $2485 \pm 45$ 年BP(半衰期为5568年),可提供参考。

从井沟子墓葬的丧葬习俗和随葬品来看,这类遗存与当地夏家店上层文化显非同一文化系统。但两者又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因素,如井沟子夹砂带领罐的高直颈特征、外叠唇陶钵、个别陶鬲腹部带釜的作风、弹簧式耳环、铃形饰、S形卷云纹饰、联珠形饰、铜泡、齿柄小刀、扁茎凹格式短剑、箕形蚌饰等,这些类型品体现了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同类器或一些制作风格上的联系。就目前掌握的材料还难以确认井沟子遗存的主要来源。

与井沟子遗存大体同时,在西拉木伦河以南区域并存着铁匠沟、水泉和以周家地墓地为代表的3种遗存。据介绍,铁匠沟A区的3座墓已遭破坏,仅知均为土坑竖穴墓,呈西北—东南向,分单人葬和双人合葬两种,这些特征与井沟子西区墓葬比较接近。同时两者的相似性已如前文所述。但铁匠沟A区墓葬所出野猪形牌饰、虎形铜饰、环首刀、带钩等不见于井沟子西区墓葬,加之有无殉牲等情况无从知晓。所以,是否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尚有待今后的进一步工作。水泉墓地北区墓葬的葬俗与随葬品则与井沟子遗存有明显差别,两者应属于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井沟子墓葬所出少量的叠唇罐,只是吸收水泉墓葬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的文化因素而已。至于周家地墓地,以往均被定性为夏家店上层文化<sup>[78]</sup>。这批墓葬的葬俗有别于其它地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随葬的短颈罐与长铤骨镞等遗物的风格也不同,因此建议将其从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剥离出来<sup>[79]</sup>。这批墓葬与井沟子西区墓葬相比,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墓葬均西北—东南向;有合葬墓及部分墓葬早期被扰的现象;有用牲习俗;有的死者有覆面或面部覆盖大蚌壳;随葬较多的长铤骨镞等。但区别也比较明显,所以还很难对其文化属性作出判定。还需指出的是,井沟子遗址与嫩江流域的汉书二期文化亦有一定的联系。井沟子西区墓葬共出土5件陶鬲,其中3件可复原,2件为口腹残片。鬲的整体形状和纹饰风格与汉书二期文化的陶鬲较为接近。但已复原的鬲有2件为四足,另2件未能复原的鬲也可能为四足鬲。这种四足鬲尚不见于汉书二期文化。这类遗址中的陶鬲虽有可能是受汉书二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但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sup>[80]</sup>。

综合考察,“井沟子类型”所在地域、年代与畜牧射猎的生业特点,均与文献记载的东胡族相吻合。此外,人骨鉴定该人群具有明显的低颅、阔面与面部偏平的北亚人种性状,与东胡后裔鲜卑和契丹的人种特征十分接近<sup>[81]</sup>。所以,我们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有可能为东胡族的考古遗存<sup>[82]</sup>。

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处欧亚大草原东端,介于农业与游牧业的交错地带。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这里正是牧业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本地区发达的畜牧业抑或游牧业是外来的,还是原有土地利用方式适从气候环境变迁的转化?井沟子西区墓葬发掘及继续在本地区寻找同类遗存,将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重要线索,同时对我国北方地区牧业文明形成机制的探讨也具有理论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地图出版社.中国自然地理图集[M].北京:地理出版社,1984.177-183;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局综合队.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局,1989年.
- [2]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 [3] a.汪宇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通讯,1955,(5):9-13. b.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57,(1):9-20. c.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细石器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59(2):1-14. d.吕遵谔.内蒙古林西考古调查[J].考古学报.1960,(1):9-23.

- [4]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64, (1): 1-5.
- [5] 徐光冀. 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史前文化[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 83-86.
- [6] a.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3, (7): (577-586). b.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 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 1991 年发掘简报[J]. 文物. 2002, (1): 4-15.
- [7] a.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克什克腾旗龙头山第一、二次发掘简报[J]. 考古. 1991, (8): 704-712. b. 齐晓光.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A]. 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 58-72.
- [8] 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87-95. b.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53-77.
- [9] a. 克什克腾旗博物馆. 克什克腾旗上店小河沿文化墓地及遗址调查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 (1、2): 72-83. b. 克什克腾旗文物志编委会. 克什克腾旗文物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林西县水泉遗址发掘述要[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78-83.
- [1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96-113.
- [12] 齐晓光. 巴林右旗塔布敖包新石器时代及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A].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171-172.
- [13] 同[8].
- [14]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时代遗址, 待刊稿.
- [15] 杨虎. 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A].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216-226.
- [16] 克什克腾旗文化馆. 辽宁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发现商代铜甗[J]. 考古. 1977, (5):
- [17] 吕遵谔. 内蒙古林西考古调查[J], 56, 03, 5 地点. 考古学报. 1960, (1): 9-23.
- [18] 同[7].
- [19]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 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J]. 考古与文物. 2004, (1): 6-19
- [20] 见于报导的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北京东胡林、怀柔转年等。
- [21] 刘晋祥. 翁牛特旗大新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A]. 杨虎. 敖汉旗榆树山、西梁遗址[A].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131-132.
- [2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 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 1991 年发掘简报[J]. 文物. 2002, (1): 4-15.
- [23] 辛岩、方殿春. 查海遗址 1992-1994 年发掘报告[A]. 辽宁考古文集[C].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 12-43.
- [24] 刘国祥、张义成. 内蒙古喀喇沁旗发现大型小河西文化聚落[N]. 中国文物报. 2000 年 1 月 16 日。
- [25] 同[21].
- [26] 同[3] a.

- [27] 同[3] c.
- [28] 李恭笃. 辽西杨家洼遗址发现目前我国北方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J], 青年考古学家, 总第十期, 1998.
- [29] 同[22].
- [30] 徐光冀、朱延平. 辽西区古文化(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综论[A].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31] 同[23].
- [32] 索秀芬、郭治中. 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一期遗存及相关问题[A]. 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 [33] 同[8].
- [34] 同[14].
- [35] 杨虎. 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J]. 文物. 1994, (5): 37-25.
- [36] 同[9].
- [37] 同[6].
- [38] 同[10].
- [39] 刘晋祥. 翁牛特旗小善德沟新石器时代遗址[A].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130-131.
- [40] 郭治中. 内蒙古东部区新石器—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13-23.
- [41] 同[23].
- [42] 朱凤瀚. 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 考古. 1979(3). 209-222.
- [43] 朝格巴图. 查日斯台遗址调查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0, (2): 44-51.
- [44] a. 巴林右旗博物馆. 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J]. 考古. 1987, (6): 507-518. b. 朝格巴图. 红山文化玉器(那斯台出土)[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0(2).
- [45] 同[15].
- [46] 同[15].
- [47] 邵国田. 我旗五十年来考古综述[J]. 敖汉文博. 15期, 1997年.
- [48] 同[6]、[9].
- [49] 据以往考古调查资料, 发现这类遗存的地点有: 克什克腾旗经棚镇附近的瓦盆窑; 巴林右旗塔布敖包、锅撑子山、古日古勒台; 巴林左旗金龟山等。
- [50] 朱永刚. 查干木伦河流域古遗址文化类型及相关问题[J]. 图二, 4, 考古与文物. 2004, (3): 40-47.
- [51] 朱永刚. 论西梁遗存及相关问题, 待刊稿.
- [52] 冯恩学. 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J]. 辽海文物学刊. 1997, (2): 72-77.
- [53] 朱延平.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A]. 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
- [5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J]. 考古学报. 1992, (4): 437-473.

- [55] 同[42], 图九, 1、4.
- [56] 朱永刚、王立新. 大沁他拉陶器再认识[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119-124.
- [57] 同[3]b.
- [58] 王立新. 中国东北地区所见的珍珠纹陶器[A]. 边疆考古研究(第二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13-124.
- [59]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肇源白金宝. 待刊稿.
- [60] 同[7].
- [61] 王立新、齐晓光. 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J]. 北方文物, 2002, (1): 15-23.
- [62] 同[61].
- [63] 朱永刚. 论高台山文化及其与辽西青铜文化的关系[A]. 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39-156.
- [64] 朱泓. 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及相关问题[J]. 辽海文物学刊, 1989, (1): 111-122.
- [65] a. 同[60]. b. 贾鸿恩. 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J]. 文物, 1984, (2): 50-54.
- [66] 王立新. 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J]. 考古学报, 2004, (3): 234-270.
- [67] 同[50].
- [68] 同[57].
- [69] 巴林右旗博物馆. 巴林右旗古日古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 (1、2).
- [70] 李甸甫、朱声显. 科尔沁右翼中旗呼林河沿岸原始文化[J]. 文物资料丛刊(7)[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 [71] 同[16].
- [72] 苏赫. 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2, (2).
- [73] a. 林沅. 东胡与山戎的考古学探索[A]. 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6年 174-181. b. 林沅. 中国东北和北亚草原文化交流的一些现象. (韩国)博物馆纪要, 第12辑, 檀国大学中央博物馆, 1997年.
- [74] 朱永刚. 试论我国北方地区釜柄式柱脊短剑[J]. 文物, 1992, (12): 65-72.
- [75] 邵国田. 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调查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 (1、2): 84-90.
- [76] 郭治中. 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A].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297-309.
- [77] 同[19].
-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 1984, (5): 417-426.
- [79] 同[19].
- [80] 同[58].
- [81] 朱泓、张全超、李法军. 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出土人骨的人类学研究. 待刊稿.
- [82] 王立新. 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A]. 边疆考古研究(第三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84-95.

# Research on Chronology and Pedigree of Cultures at Xilamulun River Region before Qin Dynasty

ZHU Yong-gang WANG Li-xin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After large scale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excavation from 2002 to 2003 at Xilamulun River Region, we have gained many direct materials, which makes possible knowing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s at this area before Qin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ypology study,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is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9 types, which is the very basis of chronology research. Among those types of cultures, both Xiliang Neolithic site and tombs of late Bronze Ages at Jinggouzi of Linxi County are firstly recognized and confirm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earance, specialty, characteristic and chronology of those two culture types, and then goes deeper for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the point of cultural pedigree. This paper contains three main viewpoints: 1. cultures of Neolithic Age in Xilamulun River region have wide scattering and multiple origins; 2.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is the result of absorbing and conform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among which combination is the foundation between the local Late Shang relics and Gaotaihan Culture coming from Lower Liao River region; 3.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and the tombs of Late Bronze Age at Jinggouzi have no direct succeeding relationships, and the latter has the most possibility of being the remains of Donghu so far.

**Key words:** Xilamulun River Region, Chronology, Pedigree

**收稿日期:** 2005-05-30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项目批准号: 01JAZJD780003)

**作者简介:** 朱永刚 (1954-), 男,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